

與公義同行～

《牽阮的手》導演莊益增專訪

採訪撰文／林秀美

照片提供／莊益增

莊益增，1966年出生在屏東，父親是蕉農。高中還算用功，考上臺大哲學系，但4年來翹課多，理由是老師講得不怎樣。「其實我對哲學是有興趣的，高中時對人生的意義感到很困惑，以為念哲學可以解答，結果蠻失望。」話雖如此，教室外的臺大自由開闊任我行，造就了一位為小人物發聲、與公義同行的紀錄片工作者。

臺大哲學系

大學時和好幾位同班同學結為摯交，進入社會工作後經常相互打氣，對個性孤僻的莊益增來說，是非常需要的友情支持。他說他們是一群「臭味相投的匪類」，不是窩在一起喝酒、就是到活大看電影，在臺大周邊書店蒐尋簡體書，不過花最多時間做的事則是在校園散步。這群匪類於今在各自職場都有所發揮，有音樂人，有中醫師，有大學戲劇系教授。

大學剛畢業，茫然不知所向，在1991年退伍後先回屏東老家種香蕉去。會拍紀錄片完全是為了顏蘭權。顏蘭權也念哲學，東吳大學畢業後到英國轉攻電影，學成回臺第二年即遇上921大地震，她和幾位友人到中部災區，看見殘破景象，深受震撼，不滿電子媒體報導膚淺，想自己拍片，將電視框框之後的故事發掘出來。她向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申請了一筆補



少有的紀錄片夫妻檔：莊益增與顏蘭權。

莊益增拍攝《無米樂》，只為了要還給臺灣鄉村一個真實的面貌。



崑濱伯對土地的熱愛感動你我。



《無米樂》讓莊益增嶄露頭角。

助，沒想到開拍才3個月即全數用罄，夥伴散了，剩她一人硬撐。他說每次看她「一個人開車去中部，扛著攝影機拍個10多天回來」，拖著疲憊的身影單打獨鬥，極為不捨，有一天就扛起攝影機跟著去，從此一頭栽進紀錄片。他強調從來沒意願非做不可，但就這樣一步步“擦落去”，為補強專業不足，還考進臺南藝術大學紀錄片研究所攻讀。

無米樂

《無米樂》（2004）的問世，讓崑濱伯廣為人知，他們也因此闖出了名堂。不同於拍攝921，製作《無米樂》完全是他的點子。南部鄉下長大的孩子到臺北打拼多年，對電視台8點檔每每以『不認識字又兼不衛生』來醜化南部人，讓他“凍不條”，決定要扭轉這種刻板印象，「這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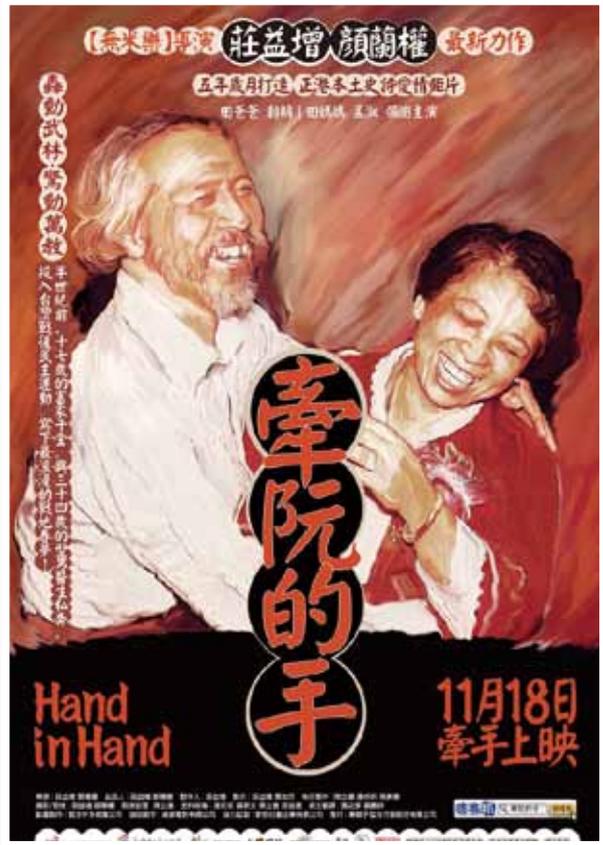
我生活或生命中真實的鄉下人完全不一樣，我第一個動機是要還給他們一個真實的面貌：他們不但親切熱情，而且是有智慧的。」就這一點來看，《無米樂》很成功。他讓人們看到，這群農民認真又努力地耕耘這塊土地，對臺灣的農業貢獻至鉅。對他們，應該給個讚。

這幾年臺灣農權和農地的問題受到社會輿論高度關注，《無米樂》不無影響，不過對莊益增的父母來說，他們在乎的其實只要兒子溫飽。莊益增坦言，紀錄片工作者是很貧困的藝術工作者，「他們對我做的事不是很瞭解，他們是單純的種田人，只求我吃得飽、人平安就夠了」。

牽阮的手

臺灣能給紀錄片的資源薄弱，要拍紀錄片就得勒緊褲帶。他們夫妻二人組是真正的獨立工作者，莊益增攝影，顏蘭權剪接，直到製作《牽阮的手》時才增加一位夥伴負責行政。為了這部原本公視的案子，負債累累，土地抵押貸款，拍了5年才完成，為什麼？「並不是我們特別有使命感，拍紀錄片是賠錢貨，公部門經費只夠頭期款，錢用完了，趕快去接拍宣導片或工商簡介來平衡一下。殺青後發誓再也不要拍了，可是有人來談案子時覺得主題不錯又接了。像是在刷信用卡，惡性循環」。

用刷信用卡上癮來比喻拍紀錄片之身不由己，只是自我解嘲，一旦決定要拍絕不便宜行事，這就是《牽阮的手》之所以和公視解約的原因。由於公視要求修改觀點，莊益增不同意，遂主動提解約，退回300多萬補助款。「他們覺得有些內容太刺激，要求林宅



2011年推出力作《牽阮的手》創造紀錄片票房新高。



《牽阮的手》敘述田孟淑與田朝明終身不渝的愛情故事。

血案要剪三分之二，鄭南榕的要全剪，這我不能接受，我不能對不起林義雄和鄭南榕。他們還要求附帶一個功能：促進藍綠和解。第一時間我聽不懂，怎麼和解？怎麼會是透過一部紀錄片去達成！藍綠不能和解是當下社會現實，如果我們不能勇敢面對過去的歷史，不去瞭解真相，不踏出第一步，怎能和解？當作沒有發生？提都不必提？」

在大學時，社會運動風

起雲湧，他只當旁觀者；拍《無米樂》，崑濱伯對土地和生命的愛，激起他的熱情；接拍《牽阮的手》，更鼓勵了這位虛無主義者，他決定不計代價去完成，「就把這當是人生中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吧。」他說：「臺灣需要轉型正義」，去年在臺北電影節首映，一位政治立場“深藍”的律師朋友看完後深受感動，告訴他要把片子介紹給泛藍的法律界朋友，因為他覺得他們需要瞭解，「若有和解可能，就是從這裡產生」。

與公義同行

2011年，《牽阮的手》上映，票房超過600萬元，勇奪該年紀錄片票房冠軍。這部田朝明和田孟淑的愛情故事，是臺灣從二次戰後60年來的政治社會變遷縮影，深深地嵌入每位觀眾的心裡。足足琢磨了5年，為了拍這部片子，顏蘭權累病了，去年搬到高雄休養、沉潛，並獲聘在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任教，二人極為滿意目前的教書生活。「我喜歡我的學生，和他們一起學習蠻

快樂的。這群孩子是被篩選的，和臺大生、政大生截然不同，他們從小低成就，學業成績表現不良，對自己相當沒信心，要他們看書很難，但適合拍片，因為他們喜歡動，行動力夠強。」

對於臺灣近年所謂的國片復興說，莊益增持保留態度，根本不認為臺灣有電影工業，他說臺灣只能有一個魏德聖。況且，文化資源分配權被政治因素左右，歷來文建會、國藝會都是政治人物把持，合法官商掛勾，資源沒有給真正需要的優秀的人才。身為五年級的他更不看好即將掌權的同世代，缺乏創造性，也缺乏為公義發聲的勇氣，所以主張儘早洗牌交替，臺灣未來才有希望。

在如此缺乏前景和錢景的紀錄片領域，是什麼動力讓莊益增和顏蘭權夫妻這麼堅定地牽著彼此的手同行？他說我們相識很久，同質性高，一路走來，共同的信念就是，「不要對不起別人——這群被我們紀錄的臺灣人，是他們推著我們向前進。」



莊益增和顏蘭權攜手在紀錄片領域，無怨無悔。